

# 第一章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 第一节 世纪之初的辛亥革命

### 一、辛亥革命前的世界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

中国是在与世界发展潮流形成巨大反差、在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封建主义腐朽统治造成的奇耻大辱和沉重苦难中，蹒跚步入 20 世纪的。

1640 年爆发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揭开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之后经过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锐不可挡之势荡涤了欧美各国。不但上述国家，而且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及西班牙、葡萄牙、瑞典、丹麦等许多国家，都先后推翻、废除了封建专制，建立了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人类由此进入了一个远较封建主义统治进步的时代——资本主义时代。上层建筑的变革解放了生产力，带动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从 18 世纪中叶开始，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了以机器生产和电气化为主要标志的两次产业革命，推动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向前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sup>①</sup> 而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和进一步变革，伴随着政治经济的这种循环往复的相互作用，到 19 世纪末，英、法、美、德、俄、日等国相继进入了资本主义的第二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其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并大都由农业国变成了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56 页。

工业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历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展示了强大的威力。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几乎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产阶级拼命追逐利润、扩大生产，在国内残酷剥削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在国外“用火和剑”疯狂侵略和掠夺亚非拉美落后国家，在强占的基础上建立了大片大片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在带来繁荣昌盛的同时，形成了严重的无可避免的社会矛盾：与本国无产阶级的矛盾，与被侵略国家和地区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而且，这些矛盾日益激化和尖锐。于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接连不断。

社会的现实矛盾 尤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推动‘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1848年 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伟大思想——马克思主义诞生。在马克思、恩格斯组织和指导下建立的“共产主义者联盟（即‘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 使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和 1905年的俄国革命，开辟了世界革命的新局面。在世界范围 社会主义的思潮汹涌激荡 激励着人们去变革社会 去追求人类美好的未来。

总之，世界处在剧烈变革之中。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互相冲撞和交融，不断以新汰旧，推动社会前进。革新，成为时代发展的强劲潮流。

此时的中国却 孑孓不前。中华民族很长时期内在世界遥遥领先，创造了灿烂夺目、令全世界仰慕不已的古代文明，但在近代落伍了。几乎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东北满族贵族入主中原，沿袭封建旧制建立了清王朝。落后的上层建筑阻碍了已经出现的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除封建社会固有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段的矛盾外，清朝政府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又增添了满

蒙贵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孕育了深刻的社会危机。在经过清初励精图治的“康乾盛世”之后，其统治很快衰落下来。到 19 世纪初已是“四海皆秋气”：皇帝昏庸无能，权臣营私苟且，吏治败坏，军备废弛。优待满蒙贵族的“八旗制度”，则进一步加剧了其统治的腐朽程度。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和贪赃枉法，成为清朝官场的一大鲜明特色。于是，人民不断奋起反抗，社会动荡不安，但统治者昏昏然犹不自觉，对内抱残守缺，优悠自得，对外夜郎自大，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由此，政局愈坏，国势江河日下。

落后就要挨打。早就觊觎中国的西方列强乘机打上门来。1840 年，英国资产阶级发动了“旨在维护鸦片贸易”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腐朽的清朝政府在侵略者面前和战不定，张惶失措，连连败绩，被迫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由此，开始了充满屈辱的中国近代历史。法国、美国接踵而来，威逼签订了《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之后，俄国、日本等大大小小的列强蜂拥而至，又先后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侵略战争。1900 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使中华民族在 20 世纪开端遭受了无与伦比的奇耻大辱。据统计，在 1840 年后的 80 年间，西方列强用武力威逼中国封建统治者与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 150 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勒索 7 亿多两白银赔款，逼迫中国开放几十个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在许多城市建立“国中之国”的租界，获得单方面最惠国待遇、协商关税权、领事裁判权、军警驻扎权及内河航行权、铁路修筑和管理权、邮电管理权、开设工矿商行和银行权、向中国政治性贷款权。列强们还恃强私分中国：英国把长江流域、法国把两广和云南、德国把山东、俄国把东北、日本把福建（1905 年日俄战争后又将东北）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总之，九州之内山河破碎，主权丧失，列强横行，百姓遭殃。中华民族沦入苦难、屈辱的深渊。

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是不甘沉沦、不甘被欺侮的，对

腐朽、反动的封建统治和疯狂侵略的帝国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反教会斗争、抗法战争、黄海大战、台湾保卫战和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等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精神。”<sup>①</sup>林则徐、龚自珍、魏源、马建忠、郑观应、康有为等一批仁人志士提出了强国御侮的革新思想。虽然这些斗争最终被中外反动派所绞杀，革新思想被冥顽不化的封建统治者所拒绝，但都给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沉重的打击。帝国主义发现，单靠他们的数万侵略军和鸦片贩子、商人、传教师及一些杀人越货的匪徒、冒险家，是不可能牢固统治中国的。于是，就扶植中国封建势力和买办势力，利用他们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寡廉鲜耻的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甘作帮凶。慈禧太后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八国联军战争后，完全勾结在一起了。帝国主义成为中国的“太上皇”，清朝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中国成了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列强利用武力攫取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甲午战争后又大规模资本输出。筑路开矿，设厂办店，使中国成为其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加工基地，进行掠夺性的开采和贸易。据统计，至 1911 年辛亥革命前，外国资本控制中国机器采煤业的 91%、生铁产量的 100%、铁路里程的 93%、航运吨位的 83%。在轻工业的纺织、缫丝、烟草、火柴、造纸、肥皂、榨油等行业中，也程度不同地居于垄断地位。外国资本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外国商品的倾销，猛烈冲击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之开始一步步走向瓦解。但帝国主义并不想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2 页。

随着帝、封的加紧勾结，封建土地制度不但继续存在，而且由于战乱和担心工商业投资风险等原因，投资兼并土地的现象仍很严重。封建地租剥削同发展起来的官僚买办资本的剥削和早已存在的城乡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明显的优势。

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效率和丰厚利润的吸引，中国一些替外商服务的买办和地主、官僚、商人及手工作坊主等，也相继集资兴办近代工商业，由此产生了近代中国的第三种经济成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它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又与之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在夹缝中艰难地却是富有生命力地一步步增多地发展着，但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经济结构的这些变化，带来两个显著的结果。一是伴随着外国商品、资本的输入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对中国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二是为了应付封建王朝的浩大开支和巨额对外赔款，清政府变本加厉地勒索劳动人民。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不但掠夺了中国人民的无数财物，而且使大批手工业者失业、破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下，中国人民日益贫困化，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这种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所罕见的。

事实清楚地表明，近代中国落后、贫穷的罪魁祸首和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从根本上摆脱落后、贫穷，就唯有革命，反帝反封建，推翻这些阻碍中国向前发展的绊脚石。

## 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挽救民族危亡，是中华民族在近代的头等大事。继农民革命之后，新兴的资产阶级也迅速掀起了民主革命的斗争。领导这一斗争的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孙中山，名文，号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1892年26岁时毕业于香港雅丽医院的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遂行医为生。目睹列强侵略、清廷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孙中山萌发了“改良祖国，拯救同群”的思想。1894年夏，他上书清廷重臣李鸿章，建议变法图存，“以中国之人民财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这一上书遭拒绝。同年，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军的事实，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和不可救药，孙中山由此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了“专为振兴中华”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相号召，并先后在广州、惠州发动反清起义。政治影响远播，成为中外闻名的中国革命的领袖。

深重的民族灾难和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影响了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纷纷投入到反清革命的行列中来。1904年，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在长沙组织了华兴会；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此外还有江西易知社、安徽岳王会及江苏、福建、广东、四川等地的类似组织。为了统一而有效地领导开展民主革命运动，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集同志，合成大团”，将各个革命小团体合并，组成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确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宗旨。“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里”。<sup>①</sup>

同盟会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同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以拥戴封建皇帝为宗旨的保皇派进行了思想论战，响亮地宣传了反清革命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觉醒；另一方面则把武装斗争放在首要地位，相继领导发动了湘赣交界的萍乡、浏阳、醴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6页。

陵起义，两广地区的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皖浙起义，以及同盟会“倾全党人力财力以起义”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虽然这一系列起义都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使之惊恐不安，感觉其统治“已成危象”。而且，这些起义震撼全国，激发起国人对革命党人的更多敬仰和支持，对清朝统治的更大仇恨，从而孕育了更大的革命风暴。

在孙中山领导下，经过革命党人的不懈奋斗，至 1911 年，革命力量已渐次遍及全国，并有许多人打入清朝“新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条件基本成熟。而清政府在这一年施行的“宪政欺骗”（在成立的所谓“责任内阁”中，满清王公贵族占绝大多数）和收回民间商办铁路修筑权转售外国资本的决定，使早已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甚至连原先热衷宪政的立宪派也对清廷不抱希望，与筑路有关的川、鄂、湘、粤等省掀起颇具声势的保路运动。革命党人则乘势酝酿发动新的武装起义。

面对危机，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变本加厉地实行镇压政策。一方面调集湖北新军前往“保路”最烈的四川去镇压，另一方面在武汉三镇实行白色恐怖：破坏革命党的起义指挥部，枪杀革命党人，并大肆搜捕。但是，清朝统治者的残暴与疯狂，激起武汉革命党人的更大怒火。虽然起义指挥机关被毁，失却了领导中枢，但形势危急，革命党人“乃各自为谋，决定及夕起事，不约而同”。

10 月 10 日晚 武昌清军工程营革命党人率先起事 守备楚望台军械库的革命党人和其他标营的革命党人群起响应。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控制了武昌。接着在 11 日晚和 12 日晨，攻占了汉口、汉阳。武昌起义胜利了。

“武昌首义天下应”，各地的革命党人迅即行动起来，革命以势不可挡的形势迅猛发展。至 11 月底，内地 18 省基本全部光复。

清政府所能控制的只有河南、直隶（今河北）和东北三省等地，而且在这些地方也爆发了规模不等的起义。由于这一年是农历辛亥年，所以史称这个革命为“辛亥革命”。

12月，独立各省代表聚集南京，推选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中国历史由此开始了民国时代。

处在四面楚歌的清王朝，情急之中被迫起用曾在戊戌变法中出卖光绪皇帝的袁世凯。而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则阴谋利用所掌握的北洋军和革命形势建立自己的独裁政权。他一方面向革命党人炫耀武力，另一方面又信誓旦旦表示“绝对赞同共和”，引诱革命党人。具有软弱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其计，以袁世凯赞同共和的条件而同意其出任民国元首，试图使革命“廉价”地取得胜利。在对革命党人诱骗成功后，袁世凯马上策动北洋将领向清廷“逼宫”要求采用共和国体。通过软硬兼施，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逊位；14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15日袁世凯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

袁世凯及其以后的北洋军阀，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凭借武力实行军事独裁，为了个人私利连年混战不休。资产阶级共和国名存实亡，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没有达到，辛亥革命失败了。

但是，辛亥革命是一次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性的重大斗争，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

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并由此终结了自秦代开始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种腐朽、落后、沉重压制中国人民、束缚中国发展的政体的废止，是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

第二，辛亥革命是推倒封建专制王朝的壮举，资产阶级共和国

的国家体制的出现，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临时约法》关于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国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通讯、信仰、集会、结社等各种自由的规定，从行动和法律上强劲地传播了民主共和的思想。虽然后来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而遭破坏，但它撒播了民主革命的种子，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的思想四处扩散，有力地推动了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的觉悟。

第三，辛亥革命既直接打击了中国封建势力，又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在中国的统治，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而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不但对近代产业，而且对近代教育、新闻出版、医疗等事业也产生了推动发展的作用。

第四，辛亥革命的成功和迅速失败，留下许许多多的经验教训。它在激励革命者继续奋斗的同时，也引发革命者去深深地思考，探寻拯救中国的出路。因此可以说，辛亥革命为后来的革命提供了借鉴，准备了条件。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 一、资产阶级革命的连续失败和无产阶级的成长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大耍两面派手腕。一方面煞有介事地表示要“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连续邀请孙中山、黄兴到北京共商国家大计，貌极诚恳，用以麻痹革命党人；另一方面制造各种借口大肆裁减、遣散革命党人掌握的军队，在六个月内连续推倒两届内阁，任命其亲信赵秉钧担任内阁总理，完全控制国务院，踌躇满志地谋求在全国建立其独裁统治。

这时，革命党处在涣散状态。孙中山、黄兴等一时被袁世凯的表白所蒙骗，认为“欲治民国，袁总统适足当之”，对袁放松警

惕。同盟会中，许多人热衷于名利地位，有些人甚至不惜与立宪派、旧官僚等结合在一起。以宋教仁为首的一部分人则幻想在袁世凯统治下实行同盟会的责任内阁制度。为此，1912年8月25日，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拉进一些小的政治团体和一批官僚、政客、名流及清朝遗老遗少，以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8人为理事，而由他实际主持党务，从而使国民党的战斗性、激进性大为减弱。

1913年2月，国会选举揭晓，国民党在总数615个议员席中获得392席的绝对多数。宋教仁对此兴高采烈，频发政见，酝酿组建以国民党为主的责任内阁。这引起一意实行独裁统治的袁世凯的极大仇恨，密令赵秉钧派人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枪杀了宋教仁。随即，袁世凯不经国会批准，以年息五厘、八四实交、盐税担保的条件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用以扩军备战。五六月间，袁世凯在调兵遣将、作好军事布置后，恶毒攻击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下令免去革命党人担任的江西、广东、安徽都督的职务，派兵向江西发出凌厉的攻势。

孙中山在宋教仁被刺后，对袁世凯的反动面目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提出“誓必去之”的号召，但国民党内响应者寥寥无几。有的主张“法律解决”，大部分国民党议员幻想在国会内倒袁，在地方掌权者则以各种理由拒绝起兵讨袁。直至北洋军咄咄逼来，国民党人才仓促应战。7月11日、15日，李烈钧、黄兴分别在江西湖口、江苏南京组织讨袁军，随后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等地也相继加入了讨伐袁世凯的行列。这即史称的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加之讨袁军步调不一，互不统属，仓促起事，所以不到两个月，“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气焰更加嚣张。他先是胁迫国会改变了《临时约法》先制定宪法然后据此选举正式总统的规

定，于 10 月 6 日组织数千名警察、地痞等包围国会，迫使国会议员在当天 3 次投票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接着，他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消亡。1914 年 3 月，袁世凯又指定人员炮制了一部“字字皆袁氏手定”的《中华民国约法》，取消责任内阁制，极大地扩充总统的权限。继之，又令人修改《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连选连任，并可推荐继任人。如此“终身总统”并可世袭的状况，袁世凯还不满足。1915 年 5 月 9 日，他与日本签订了将东北、山东、内蒙、长江流域、福建等地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并使日本操纵中国政治、经济、军事、警政的“二十一条”，以空前的卖国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然后，在这年 12 月 12 日正式称帝，神气十足地作起了“洪宪皇帝”。

这种复辟倒退的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12 月 25 日，曾任云南都督的蔡锷和唐继尧等在昆明发表讨袁檄文，宣布云南独立，出兵两路讨伐。接着，贵州、广西、广东、福建也相继独立，护国反袁斗争迅速遍及全国。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他总结失败的原因“乃同党人心之涣散”，于是在 1914 年 7 月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立完全民国为目的”。但由于强调党员必须立誓约，按手印，绝对服从孙中山，使该党陷入了狭隘的宗派主义的小圈子。中华革命党曾派人回国发动了一系列的暗杀事件和武装起义，但由于局限在少数会党和军队中，讨袁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袁世凯称帝后，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中华革命党人积极参与了护国运动，但由于没有鲜明的政治主张和坚实的组织力量，没有能够掌握运动的领导权。

由于中国人民风起云涌的反袁斗争，德、奥、英、法、俄等国改变了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态度，曾竭力支持袁世凯复辟的日本政府也转而指责袁世凯“断行帝制”，“日政府当然不能承认”。北

洋军阀内部也因国内形势和权益地位冲突而四分五裂：袁的心腹大将段祺瑞、冯国璋不但对帝制消极旁观，而且联络一些将领拟另树一帜；袁的老友徐世昌辞职而别；大多数军政长官与袁貌合神离。迫于内外交困、众叛亲离，1916年3月22日仅仅作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无奈地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在举国上下一片反对与唾骂声中，袁世凯因尿毒症等病发作加上羞恼交逼而一命呜呼。

但是，护国运动还是没有实现资产阶级的革命目标。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总统，而实权操纵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两者为权益展开了激烈的“府院之争”。1917年5月22日黎元洪免去段祺瑞职务，段祺瑞却操纵皖系军阀在七八个省宣布独立。复辟狂张勋乘机率领他的还留着清朝辫子的“辫子军”进入北京，在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后，于7月1日捧出清逊帝溥仪复辟帝制。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声中，曾对张勋复辟达成默契的段祺瑞转而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7月12日，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勋复辟闹剧在12天后草草收场。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身份重掌大权，但他蛮横地毁弃《临时约法》，拒绝恢复国会，并以牺牲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代价，大肆向日本借款，刻意加强其专制独裁的统治。

孙中山一直认为“约法和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针对段祺瑞的毁法横行，1917年8月，他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筹备成立护法军政府，任陆海军大元帅，发起讨伐段祺瑞的护法运动。

但是，孙中山所主要依靠的西南军阀，并不真心拥护孙中山，而是企图借“护法”来抵制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的威胁，据地称雄。因此，当情况发生变化后，他们立即排挤孙中山。1918年5月，在桂系军阀和政学系操纵下，广州非常国会废除大元帅首领制，改行总裁合议制，孙中山仅为七总裁之一。护法军政府成为南方军阀的政权，孙中山发动的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

1919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重振旗鼓继续奋斗。1920年10月，经孙中山从多方面加强的革命军，经过激战收复了广东。孙中山返回广州恢复军政府，在次年4月被推举为非常大总统，再次发动护法战争，并于9月平定了广西。正当孙中山部署继续北伐时，他亲自培植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却暗中与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相勾结，公开破坏北伐，进而在1922年6月16日炮击孙中山所居的总统府。孙中山脱险登上“永丰”军舰组织反击叛军，但回师的北伐军遭到南北军阀夹击失败。孙中山遭受了一生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遭受的这一连串失败说明，资产阶级无法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同时期，农民阶级也开展了反对北洋军阀封建统治的斗争。据不完全统计，1912年到1919年间，农民的抗捐、抗粮、抗税斗争至少在200起以上，几乎遍及全国各省。除经济斗争外，一些农民武装还参加了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规模最大的以白朗为首领的农民起义曾绵延数年，在1913年、1914年间发展到数万人，转战河南、湖北、安徽、陕西、甘肃等省，他们以“劫富济贫”为口号，一度又改称公民讨贼军，宣言讨袁，颇有声势。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农民的斗争虽然给予封建统治者很大的打击，但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

然而，就在革命陷入困窘的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变化：无产阶级发展壮大。

中国无产阶级最早出现在鸦片战争后的外国在华企业中，之后出现在清朝官僚所办的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中。它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中国早期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开办近代工业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发展缓慢，到19世纪末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大约只有近10万人。

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近代产业的发展，产业工人增长速度

加快，辛亥革命前增加到 60 万人左右。辛亥革命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且需要从中国进口物资，中国民族工业获得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到 1919 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达到 200 万左右。

作为新型的社会力量，中国无产阶级具有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等世界无产阶级共有的优点，同时，由于特殊的国情，中国无产阶级还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 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 劳动条件十分恶劣，毫无劳动保障；没有人身自由和民主权利；劳动时间长、强度大而工资十分微薄，因而生活极端困苦，改变自己悲惨待遇的要求非常强烈，革命最坚决和最彻底；第二，近代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和交通沿线的大中城市和一些大的企业中，如上海、天津、武汉、青岛、广州、大连、哈尔滨等城市和纺织、铁路、航运、面粉、卷烟、火柴等行业 因此工人集中程度高，易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第三，工人大多出身于破产农民，与广大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便于和广大农民尤其是贫农结成巩固的联盟，使工人阶级领导中国革命具有极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是近代中国社会中最先进、最革命、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当然 中国无产阶级也存在着人数较少（与农民相比）、文化水平低（与资产阶级相比）、比较容易接受小资产阶级和封建思想影响等弱点。这是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只有待进一步发展，并在其先进政党的指导下去克服。

中国无产阶级自产生时起，就不断地进行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辛亥革命后，随着工人阶级的壮大，斗争也有了较大发展，1912 年至 1919 年五四运动前，有记载的罢工共达 130 多次。这一时期工人斗争呈现出新的特点： 斗争逐年增多； 开始出现行业和地区的同盟罢工； 主要是经济斗争，但也出现一些在民族资产阶级影响下的政治性的罢工斗争，如 1915 年反对袁世凯与日

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抵制日货运动和 1916 年天津工人反对法国政府将租界扩占到老西开地区的罢工斗争；罢工中出现近代工会组织，如天津工人反对法国强占老西开斗争中成立了工团和工团事务所，1917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工人在罢工中成立工会等。这些情况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在发展和斗争中逐渐觉醒，虽然还处在自在阶级的状态，但正在向自为阶级的方向转化，将在未来的中国社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随着新式学校的发展和为数众多的留学生人群的形成，近代中国出现了经受近代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队伍。其中除少数人投靠帝国主义和军阀买办势力外，大多数人怀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们中有的人尝试走“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有的人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以各种形式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而青年学生则走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的前列。1915 年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和 1916 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国内学生和留日学生都是积极的参加者。1918 年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损害国家主权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消息传出后，留日学生组织救国团，罢学回国；国内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福建等地学生积极响应，纷纷举行集会、请愿或罢课，要求废除卖国条约。之后，又相继成立了北京学生爱国会和全国学生救国会，开展反帝爱国的宣传组织活动。青年学生眼界开阔、思想活跃、爱国热情高，成为一支很有生气的革命力量，在近代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显示了先锋和桥梁的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这些变化和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长，为新的革命风暴的到来创造了客观的社会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 二、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

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袁世凯在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通

令全国“祭天祭孔”“尊孔读经”。于是，社会上“孔道会”“孔教会”、“尊孔会”之类组织纷纷出现，封建学者、御用文人乘势大肆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诋毁自由平等和民主共和思想，一时守旧循古的论调甚嚣尘上。针对这股逆流，陈独秀等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联袂掀起了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的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1880年生，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日本，古文造诣颇高，曾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改名《新青年》），猛烈抨击社会的黑暗现象，号召青年解放思想，敢于怀疑那些从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陈腐观点，以求实进取的精神奋起自救。1916年，陈独秀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迁往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先后参与编辑《新青年》或为之撰稿，新文化运动阵容强大，以强劲的势头风靡全国。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尤其是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教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并通过这种鞭挞声讨封建主义的旧政治。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疾呼“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伦理道德，揭露三纲五常是“奴隶的道德”，忠孝节义是“吃人的礼教”；提倡科学，反对愚昧和迷信，要求必须“科学与人权并重”；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要求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

封建守旧文人曾跳出与新文化运动较量，但很快就败下阵去。新文化运动以犀利的批判、磅礴的气势给予封建的专制主义、伦理道德、迷信和愚昧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给辛亥革命后死寂沉沉的中国思想界以巨大震动，虽然它有否定一切传统文化的片面性等严重缺点，但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一新耳目的作用。它

猛烈冲击了长期束缚人民的封建思想，启发人们从盲从、蒙昧中解放出来，去追求和探索新思想，唤起人们尤其是青年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并为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各种思想流派传播到中国敞开了大门。因此，它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

早在 20 世纪初，国内就曾有人介绍过马克思及其学说，但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在国内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自近代以来，人们都是把救亡强国的希望寄托在学习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上。然而，1914 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空前残酷的形式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尖锐地暴露出来，令人震惊，引起人们对“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那么，中国的出路在何方呢？在人们徬徨之际，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将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俄国和中国国情基本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相近（经济文化落后），俄国工农大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壮举，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对正在探寻中国出路的先进分子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和吸引力。他们从中看到了中国民族解放的希望，获得了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于是，在中华大地新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在中国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李大钊，1889 年生，河北乐亭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担任过报纸、杂志主编。1918 年初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长，后任教授。他经过深入观察和缜密思考，在 1918 年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